

中国现代文学论争 与文化政治

——“民族形式”文艺争论及相关问题

毕 海◎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论争 与文化政治

——“民族形式”文艺争论及相关问题

毕 海◎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现代文学论争与文化政治：“民族形式”文艺争论及
相关问题/毕海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11

ISBN 978 - 7 - 5203 - 0959 - 2

I. ①中… II. ①毕…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史
—文学史研究 IV. ①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20232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席建海
责任校对 冯英爽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3.5
插 页 2
字 数 295 千字
定 价 9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由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学科建设经费资助出版

序 言

不清楚现在的学生或学者们，倘不专门研究文艺大众化一类问题，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那场著名的“民族形式”论争会有怎样的印象。我自己，从读书到忝列教授，很长时间内对这场论争都不甚了然，也从未下功夫去探究，除了记得几个人名、几篇文章外，对它的认识，没有超过本科生文学史知识的范围。

几年前，当毕海对我讲他决定以这个题目做博士论文时，我既感意外，也颇有兴趣，希望通过他的细致研究，能把这团乱麻理一理。对他的选择我之所以比较放心，是因为他的选题不是从“理论”学习的抽象概念中产生的，而是经过一年多埋头阅读报刊史料，从大量文献中捕捉到问题并反复思考后最终确定下来的。

起初，他主要从探讨当代文学起源的目的出发，清理“民族形式”论辩与延安文学的关系。然而，随着阅读与思考的深入，隐藏在这个概念背后的意识形态问题越来越清晰，使他最后跳出了学界多年来始终为“形式”之名所囿而局限于文艺大众化思潮的论述框架，触到了“民族形式”概念所承载的政党文化建构的重大理论意义，因而为这一主题的研究贡献了新的见解。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属于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场革命，是有阶级无国界的无产阶级革命，最终目的是消灭资产阶级政党领



导的民族国家，从而“将红旗插遍全球”。因此，井冈山成立的红色政权，亦以外国的“苏维埃共和国”命名；而“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也便是这种世界革命意识形态的产物。然而，“九一八”以后，随着德、日、意法西斯邪恶轴心对世界政局的改变，尤其当1938年全面抗战爆发，中国红色革命政权面临合法化问题。抗日战争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格局，也改变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论述，使之暂时搁置世界主义和阶级论，转向民族主义和民主建国论，并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政治实践理论，其话语的主要特征，就是应现实需要随时调整战略方针，灵活规范并处理“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毛泽东《矛盾论》），或者说，以功利目的处理“经”与“权”的关系（即“经常的道理”和“权宜之计”）。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意识形态话语的转变与建构过程中，“民族形式”是其话语从阶级论转变为民族主义的功能性概念之一。“民族形式”这个概念，原本内涵模糊，边界不清，却为充满矛盾的理论言说提供了通道和空间。毕海抓住了这个本质，并在吸收前人研究观点的基础上，从“大处”着手，拎起了这段有始无终、歧义丛生的“民族形式”讨论，使这场论辩的发生原因与实际意义，有了一种令人信服的新颖的解释，他的博士论文因此得到专家们的好评。尽管这篇论文还有不少缺陷，此后亦未能充分进行补充和提升，但在短短三年时间内，对一个文学史上的理论概念做出了清晰的历史梳理，也算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记得王富仁老师博士论文出版、李何林先生为他写序时，李先生就把答辩委员会的决议抄下来作为他的主要意见。今天，我也东施效颦，将毕海答辩时答辩委员会的决议抄录一遍，作为对毕海这篇论文的客观评价——



毕海的论文《1940年代前后文学的“民族形式”问题研究》，围绕四十年代“民族形式”论争，从一个较为新颖的角度，运用翔实材料对“民族形式”问题进行理论论证。

论文打破了过去从文学大众化角度论证“民族形式”的惯例，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入手，将“民族形式”与政党政治和意识形态联系，试图从历史材料和文本分析中还原历史的建构过程。作者阅读了大量文献，做了较为扎实的理论准备，论文核心观点新颖，能在材料基础上论证，力求客观。对四十年代政党文化背景下的文字实践，进行了富于探索的论证。在原创性和学术品格上均显示出值得肯定的长处，并显示了理论辨析的长处。

但论文在历史呈现与理论之间，尚有不够贴切和完满的地方。个别具体的结论，可再斟酌。

答辩委员会对毕海的论文进行了认真审议。从总体上看这是一篇问题意识突出、颇有创见、比较优秀的学术论文。毕海认真回答了答辩委员会的问题。答辩委员会对毕海的答辩表示满意。答辩委员会由五位专家组成，经投票表决，一致通过其论文答辩，建议授予毕海博士学位。

答辩委员会主席（签字）：解志熙

毕海对学术一向持敬畏态度，肯吃苦，能下功夫。这样一种踏实诚笃的个性，在高校坐冷板凳倒是相宜的。他在论文即将出版时，嘱我作序。作为曾经的导师，似乎责无旁贷；但作为今日的同行，实在没有权力再对他的研究指手画脚。只是有些体会，可以分享。

记得读硕士研究生时，同学黄开发经常开导我们说，学位论文选择什么样的研究对象，对自己的成长至关重要。这是有几分道理的。研究



鲁迅的学者，王富仁、钱理群等老师，不都有几分鲁迅先生的风骨吗？而开发兄多年致力于知堂研究，果然除了学问精深，还散文小品一本接一本出，其对生活趣味的享受令我等粗人羡慕不已。这其实是说，读什么书，培养什么样的性情。孙犁从青年时代起，就循着鲁迅的书帐读书，这份经验，使他在“文革”中“伤心悟道”，而未如很多同人那样在“紧跟”中丧失自我，晚年如凤凰涅槃，写下一生最好的文字。在无需为学位论文的“突破”考虑选题时，下一步选择什么来作为较长时段的阅读与研究，也许是值得毕海花些时间来考虑的。

杨联芬

2017年2月1日农历正月初五写毕于京西无为居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民族形式”文艺论争中的文化政治	38
第一节 “民族形式”的提出	38
第二节 “民族形式”：文化认同与文化动员	51
第三节 “民族形式”论争：文艺与文化政治	70
第二章 “民族形式”论争与“五四”文学传统	89
第一节 新启蒙运动对“五四”革命文化传统的建构	90
第二节 “民族形式”运动对“五四”文艺的重审	107
第三节 延安“五四传统”的形成和建构新的文学形态	124



第三章 “民族形式”论争与现代启蒙文化	142
第一节 胡风的“质疑”：启蒙话语交锋与“民族形式”	
论争的内涵	144
第二节 丁玲的“转变”：启蒙话语危机与“民族形式”	
论争的结果	174
第四章 “民族形式”论争与民间文学资源论	201
第一节 “民族”“民间”与“民族形式”文学运动	201
第二节 民歌与柯仲平对“民族形式”诗歌的探索	232
第三节 旧形式与新文学：老舍的创作实践与思考	253
第五章 延安文艺：理论建构与“民族形式”文艺实践	272
第一节 《讲话》与“民族形式”论争的结论	273
第二节 《白毛女》：“民族形式”抑或“文化杂交”	287
第三节 赵树理：“新形式”与“民族形式”典范的被确立	299
第四节 孙犁：“民族形式”对文学“民族化”的误读	321
结 语	341
主要参考文献	345
后 记	365

导 论

一 重新理解中国现代文学论争

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进程的突出现象之一，是不断上演频繁的文学论争。现代文学每一次文学观念的演进，文学社团和文学流派的形成，文坛的分化与作家群体的矛盾纷争，甚至文学空间中心的位移，都与文学论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国现代文学论争史。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正是从文学论争开始的。晚清文学三大革命——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黄遵宪主张将“新思想”“新语句”“新境界”与传统诗文形式相结合，大量引进“新名词”“新概念”，提倡以“俗语文体”表达“欧西之思想”，论争“文学”在启蒙民众思想、改良民族精神和再造社会文明等方面的重要功能和现实意义。梁启超更是以“笔锋常带感情”的新文体批判旧小说“诲淫诲盗”，论争中国“群治腐败”“精神萎靡”与旧小说的联系，提出革新小说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①

旧小说与新小说，旧文学与新文学，二元对立的文学观念在论辩中得以确立。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进一步将“新/旧——进步/落后”的“进化论”文学观推向极致。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新文学的生成，这是中国文学和文化“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一系列的“论战”中——与林纾的论争、与学衡派的论辩，新文学知识群体明确了“敌人”，也厘清了自己的立场，最终取得了对旧文学摧枯拉朽般的胜利。正如一位研究者所指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中的“论争”概念具有非常鲜明的建构性。中国新文学是在“骂战”中生成的，“骂”是《新青年》展开文化批评和文学批评的重要方式。^②“五四”时期，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围绕文学是“为人生”还是“为艺术”展开论争，双方基于不同的文学观念，各自寻找对自己有利的西方文学资源，展开驳难，以致周作人不得不调和二者的矛盾，宣扬其“人生的艺术派”的立场。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革命文学论争”让中国现代文学发展面貌再度发生巨变。后期创造社、太阳社挑起与鲁迅等“五四”作家群体的论战，鼓吹普罗文艺，倡导文学做“政治的留声机”。正是在论争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得到广泛传播，进一步推动了中国文学观念的革新。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同样离不开文学论争，面临严峻的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

①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全集》第2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884页。

② 李哲：《“骂”与〈新青年〉批评话语的建构》，山东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2页。



策提出之后，文艺界发生了“两个口号”——“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大众文学”的论争。30年代自由主义作家和左翼作家之间，国民党右翼文人与左翼作家之间，同样发生多次文学论争。鲁迅与梁实秋关于文学“人性”论的论争；沈从文的《论“海派”》挑起的“京派、海派之争”；鲁迅与林语堂等人关于“性灵文学”和“幽默文学”的论争；左翼作家与“第三种人”的论争；鲁迅、茅盾等人与“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倡导者们的论争……抗战开始后，相继爆发了梁实秋与新文人作家群体之间“与抗战无关论”的论争，张天翼的《华威先生》引发的“讽刺与暴露”的论争；随后又有“民族形式”文艺论争；胡风与部分左翼理论家有关“现实主义”的论争等，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还有《大众文艺丛刊》对自由主义作家的整肃和论争……可以说，文学论争和文学论战贯穿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始终。

为什么中国现代文学之文学论争如此频繁地发生？为什么中国现代文学运动和文学思潮的发展往往以论争运动的方式展开？中国现代文学论争之大量、反复地出现，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历史建构性。在中国，“文学”是一个古老而重要的词汇，文学作为一个知识领域，也长期占据着中国文化的核心位置。但历史上的“文学”与现代汉语中的“文学”其内涵和外延却不尽相同。古代“文学”概念，一般是“文章”和“学术”的合称：前者指写作（文体写作，类似于今天的文学，但范围要广得多，包含各类文体的“大文学”）；后者指对经典文献的研究（经学、典籍研究、小学、语言文字学），这与现代文学的概念并不一致。^①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实际上是一种现代性知识和文化的产物，日本学者柄谷行人在其《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一书中借

^① 参见李怡主编《词语的历史与思想的嬗变——追问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概念》，巴蜀书社2013年版，第38页。



用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的一段话，“少时曾喜读汉籍。所学期间虽短，然漠然冥冥之中由《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而略知何为文学之定义。暗中思忖英国文学亦当如此也，若果真如此则举有生之年而习之，亦当无悔。……春秋十载于吾有之，不敢言无学习之余暇，只恨难能彻底习之。然毕业后不知为何脑中竟被英国文学所欺而生不安之感念”引出一个问题，即何为“文学”？柄谷行人认为，“我们不应该把漱石这种感念笼统称为接触到非本民族文化者的认同危机。因为这样说时，我们已经将‘文学’视为不证自明的东西，而看不到‘文学’之意识形态性了”^①。的确，不能仅把夏目漱石对“文学”概念内涵的困惑看作一个东西方文化差异的认同危机，而需深入思考现代“文学”的起源问题。夏目漱石的疑问恰好将“文学”这一概念的历史建构性，将“文学”作为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文化产物的特征给呈现出来了。现代文化视域中的“文学”并非是“不证自明”的概念，而是一种现代性的“风景”，更明确地说是一种一旦确立起源（历史建构性）就被掩盖的“现代制度”。正是从“知识考古学”的角度，王德威提出了“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概念，这一口号除了涉及“晚清文学”与“五四文学”的关联性之外，更指出了“现代文学”的建构性和历史性。换言之，迄今为止，我们所有的文学观念和认知，都是一种现代性的发明。所谓的“文学”，都是现代性装置（或者用哈贝马斯的话说是一整套现代性方案）的产物。如果没有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等人在论争中的建构和阐释，也就不会有现代意义上的“文学”。

实际上，不仅中国现代文学具有历史建构性，“文学”观念本身即是“现代性”的产物，乔纳森·卡勒在其《文学理论》一书中所指出

^① [日] 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年版，第 8 页。



的：“如今我们称之为 literature（著述）的是二十五个世纪以来人们撰写的著作。Literature 的现代含义——文学，才不过二百年。1800 年之前，literature 这个词和它在其他欧洲语言中相似的词指的是‘著作’，或者‘书本知识’。”^① 由此可知，“文学”是现代思想文化观念的产物，中国现代文学更是中西文化交汇现代性知识生产的产物。现代文学观念和古典文学观念既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又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故不免发生争论。何为文学？如何理解文学的内涵？文学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争论贯穿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始终。不论是“五四”时期文学革命看重文学的启蒙主义内涵，还是“革命文学”论争中将文学看作政治的“留声机”，再抑或是京派文人、自由主义作家群体对文学“人性”的强调，都在不断的文学论争中展开对现代“文学”内涵的思考和表达。1948 年，袁可嘉写作《我的文学观》，表明自己对文学的看法：

一个比较完美的文学观，如我在上面所指陈的，一定得包含社会学的、心理学的和美学的三个方面，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文学的价值在对于社会的传达；从心理学来说，它的价值在个人的创造，从美学来说，它的价值在文字的艺术，而三者绝对是相辅相成、有机综合的，否则即不会有文学作品。在这个文学观里，我们必须坚持几点：（一）三者的影响是互相的，而非单方面的，是渗透的，而非外加的；（二）社会学的观点不仅指马克思的理论（虽然它是极重要的社会学说之一），心理学的认识也不仅指弗洛伊德的学说，美学的也并非只指克罗齐的见解；这个文学观更不仅是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 + 弗洛伊德的性和下意识 + 克罗齐的直觉；我们

^① [美] 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1 页。



必须利用全部文化、学术的成果来接近文学，了解文学，而决不可自限于某一套的教条或自缚于某一种的迷信；（三）尤其重要的，无论从哪一观点来看文学，我们的目的都在欣赏文学，研究文学，创造文学，而非别的。^①

袁可嘉指出的“完美文学观”，文学所呈现出的“三种辩证地渗透，有机地综合的关系”，实际上正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进程中，对“文学”观念形态及其内涵不断争论、探讨的结果。而他所特意强调的社会学、心理学和美学的认识、观点及这三种文学观的影响、关联和目的，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有关“文学”本体论争及建构现代文学观念价值的表现。

中国现代文学论争的频繁发生，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现代文学生成的特殊历史文化语境。中国现代文学得以确立的根基和特征不在中国古代传统之中，亦不在西方文学传统之中，而是中国现代这一特殊历史文化空间的产物。中国现代文学伴随着中国文化从古典到现代的整体性转变而发生，这就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杂芜性”。陈方竞指出：“我们常常说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就是在对中国社会文化的整体批判中产生的，社会批判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的必要前提和保证……这就是说，中国现代文学的审美现代性的形成，是建立在对中国社会文化的整体批判之上的，是通过具有社会批判性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审美形态发展实现的。”^② 这种批判性的文化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学的特征，必然呈现出一种论争建构性的文化形态。中国传统社会的保守性，几千年帝国制度延续的惯性，以及“超稳定结构”文

① 袁可嘉：《我的文学观》，《论新诗现代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10—111页。

② 陈方竞：《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2—33页。

化的惰性，都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生成和革新，绝非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文化的每一步推进，都伴随着激烈的论争。鲁迅曾在《娜拉走后怎样》中直言现代中国文化变革的艰难：“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① 在《无声的中国》一文中，鲁迅又再次强调“激烈主张”对推进改革的重要性：

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时白话文之得以通行，就因为有废掉中国字而用罗马字母的议论的缘故。^②

正是在激烈的论争中，白话文运动才得以兴起。实际上，不仅仅是文言白话的争论，新旧文化观念的对抗也同样贯穿了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发展的始终。王富仁在论及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时曾经指出：“不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还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社会在整体上仍然是一个文化极端落后的社会，这决定了政治对中国社会整体的决定性作用，也决定了政治关系对整个社会关系的主导作用。”^③ 政治对中国社会关系的主导作用，表现在文学上，就是新文学作家群体迫切需要通过“发声”——论争、论战获取生存空间，扩大新文学的影响，进而让中国新文学落地生根发芽，如同新生的树苗，需要不断浇水，方能茁壮

① 鲁迅：《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1），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1页。

② 鲁迅：《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4），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

③ 王富仁：《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略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